

金庸小说，可说是有史以来，中国小说当中读者最多的。——胡菊人

小说金庸

胡菊人 著

精装典藏本

解读金庸小说的金钥匙
揭示武侠泰斗的创作秘密

明月文库



胡菊人 著

小说 金庸

精
装
典
藏
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金庸 / 胡菊人著.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92-9458-2

I. ①小… II. ①胡… III. ①侠义小说—小说评论—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4978 号

小说金庸

XIAOSHUO JINYONG

胡菊人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mm×1092mm 32 开本 9 印张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9458-2

定价: 42.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 -02-2017-39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胡菊人，提灯人

陈浩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香港文化界，胡菊人这个名字是无人不晓的。

六十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持续，殖民地环境中的香港青年则颇受西方享乐主义、颓废思潮的影响，在艰辛的现实生活中颇感迷茫，像在雾中看不到前途，更看不到国家民族的前景。这个时期，一些高质素、有分量的青年与知识分子的刊物，就如迷雾中的一盏灯，为年轻人照亮了前路，指引他们行进的方向。胡菊人先生正是提灯人的代表人物。

从六十年代开始，胡菊人先后担任过《大学生活》杂志社社长与主编、《中国学生周报》（下称《中周》）社长、

《今日世界》丛书编辑、《明报月刊》（下称《明月》）编辑、《中报》与《中报月刊》总编辑和《百姓》半月刊主编，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曾读过胡先生的文章和书，看过他编的刊物，受到他的影响。文化界中人称胡先生为青年导师，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到他家中访问，和胡先生分享他逾半个世纪的文化人生之旅。从青年导师到文化旗手，胡先生的人生旅程丰富多彩、亮丽耀眼，对传播媒介和文学写作有重大贡献。

从《大学生活》到《中国学生周报》

胡菊人原名胡秉文，广东顺德人，一九三三年出生。一九五〇年，当他还是一个初中三年级学生时，他就随两位远房亲戚到香港谋生，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他先后在圣类斯中学当校役，及在教堂当杂役。那时候，他就住在学校和教堂里。胡菊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并非书香世家，族中祖辈无一文人，但他却自小就对文学写作有浓厚兴趣，喜欢阅读，而且范围广泛。少年时代，《红楼梦》《水浒传》

这些古典小说已是他的至爱了。

一九五五年，胡菊人在徐东滨的介绍下进入友联出版社，任职于资料部，夜间在珠海书院英语系攻读。经过六年艰苦的半工半读生涯，于一九六一年完成课程。

自珠海毕业后，胡菊人曾任友联出版社旗下的《大学生生活》杂志的社长兼主编，后又出任《中周》社长。友联在当时是一间颇具规模的文化机构，由美国方面的资金兴办，分为研究所、出版社、杂志、发行公司、印刷厂等多个部门，可说是“一条龙”运作。友联属下的杂志有《祖国》周刊、《大学生生活》、《中周》与《儿童乐园》，分别针对不同年龄的读者，从小孩到成年人，一网打尽。

此外，美国新闻处所办的《今日世界》半月刊和《今日世界》丛书也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这就是人们后来所称的“美元文化”，或叫“绿背文化”。左派阵营为了与之抗衡，也创办了《文艺世纪》《青年乐园》《小朋友画报》等刊物。当时，竞争最激烈的是《中周》与《青年乐园》，它们都拥有大量读者，各擅胜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胡菊人主持的《中周》大捧胡适，陈序臻督印的《青年乐园》则

尊崇鲁迅。两份刊物都没有太多正面谈及政治的文章，但各自明显地有着不同的取向。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界左右壁垒分明。当时，本土作家不多，大多数的作家、文化人都是由中国内地南下的，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南来作家”，如徐吁、卜少夫、徐东滨、司马长风、徐速等，左派的有侣伦、黄谷柳、何达、陈君葆、吴其敏等，还有曹聚仁、李辉英、叶灵凤、刘以鬯等。不过，尽管两个阵营所经营的刊物有不同的主观目的，但刊物本身和作家的创作却产生了推动香港文化与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效果。相信那些启蒙式的青少年刊物对当年盛极一时的文社潮也起了积极的影响与催化作用。因而，今天回望，无论“绿背文化”还是“红背文化”，只要它们促进了本土的文化发展，就未尝不是好事。

当年，友联的主事人有史诚之、余德欢、徐东滨、赵聪等。胡菊人任《中周》社长时，主编先后是刘貽恢和杨启明，司马长风担任顾问。曾在《中周》任编辑的有陆离、吴平、盛紫娟、蔡炎培等，经常撰稿的有王敬羲、西西、罗卡、石琪、古兆申、戴天、小思、黄维樑、黄子程、也斯、

金炳兴、许定铭等。这些当年的文艺青年，后来都活跃于文化、文学界，甚至成了独当一面的名家，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壮大了本土作家的阵容。《中周》的内容涵盖文学、电影、音乐、西方文化潮流等各方面，对一代人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胡菊人忆述友联时期说：“当时一班主事人大多是自由主义者，出资的美方也不大干预，编辑与业务都有很大的自主权。”现在往回看，人们也许会疑惑《中周》当时为何会那么受欢迎、影响那么大呢？胡菊人说：“主要就是内容好，引导青年向上，而办事的人也都积极、热心。”

近年，不少学人把《中周》作为研究对象，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也把《中周》上网，可见时至今日，它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与此同时，该中心亦收藏了《青年乐园》的合订本，供研究者查阅。对于当年两份刊物的激烈竞争，胡菊人欣然说：“这是好事，有竞争才有进步，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

一九六二年，胡菊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做为期半年的考察。回港后即在戴天的推荐下出任美国新闻处

《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此丛书网罗了许多名家，翻译出版美国的文学作品和社科书籍，当年，张爱玲也在宋淇的引荐下参与翻译工作。

青年导师，才艺双全

六七十年代，胡菊人追随当时西方新兴起的自由大学理念，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合办了创建学院。学院由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赴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的林悦恒出任校长，他也是友联后期的主事人。创建学院开办时，胡菊人和戴天在太子道合租了一个地方，古兆申、黄维樑等人都住过，学院就在那里上课。学院曾开办的课程有戴天教授的诗作坊、罗卡教授的电影欣赏，而胡菊人则开办了小说阅读课程，当时的学员有李国威、淮远、钟玲玲等。包错石、钟华楠等人都曾担任课程导师。胡菊人回忆说：“当时的学员总数有二三十人之众。我的太太刘美美就是参加小说阅读课程时结识的。后来，创建学院的活动随着我迁移到土瓜湾去了。”这个时期，胡先生已有“青年导师”的美誉。在平时工作的空隙余

暇，他也常与青年朋友见面倾谈。年轻人们得以亲炙心目中敬仰的师长，亲聆教诲，自是获益不浅了。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胡菊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语出《论语》）”的确，这就是胡菊人外冷内热、坚守原则的性格了。胡菊人生活简单俭朴，但却慷慨助人，特别是对青年朋辈，常常解囊资助他们的生活与活动，从不吝啬。于是，他的房子愈住愈小，后来又从土瓜湾搬到了筲箕湾去。

胡先生个性比较内敛，温文尔雅，待人和蔼可亲，同时，他也有名士风范，也有逸兴遄飞的豪放一面。刘绍铭在《借问酒仙何处有？》一文中写到胡菊人：“陌生地酒友零落，可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的香港，以笔者的圈子来说，真是一呼四应。二胡（胡金铨、胡菊人），一戴（天）一林（悦恒）。……黄汤一灌，各露情性。……酒量并不怎样惊人而好作‘仙’状的是胡菊人与戴天。菊人一醉，就露青年导师本色，满嘴尽是使命感。……但他们的酒量实在平平，每于事后要人扶他们一把。若不扶，他们回家时就乱按门铃，他乡作故乡。”

胡菊人还会弹古琴，他师从古琴名家蔡德允，习艺多

年。这天，我问胡先生：“有人说你弹奏古琴之前要沐浴更衣，焚香静坐，真的这么认真严肃吗？”胡先生笑着说：“没有，没这么严肃。”然而，看到胡先生穿着唐装演奏古琴，在大会堂音乐厅表演的照片，还是一片名士之风。我问他最喜爱什么古琴曲，他立即冲口而出：《广陵散》。真希望有一天能欣赏到身穿古朴优雅唐装的胡先生弹奏一曲《广陵散》，得以一发思古之幽情。

在《明报月刊》的黄金时期

胡菊人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他一生中最精壮的岁月是在《明月》度过的，那是一九六七年，胡菊人应《明报》老板查良镛（金庸）先生的邀请出任《明月》总编辑。查良镛不但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也是香港早年文人办报成功的典型例子。六七十年代是《明报》崛起的时期，那时《明报》已逐渐成为知识分子不能不看报纸。

《明月》是《明报》机构另一个亮丽的招牌，创刊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当时，香港因其特殊的地位

而具有其他华人地区所没有的有利条件与环境，扎根香港的《明月》也成就了其他地方的刊物办不到的辉煌。

《明月》创立后一直由查先生自掌编务，直至找到胡菊人，才把总编辑的重任交放到他肩上。胡菊人说：“当时，我为《明月》所写的一篇谈美国披头士的文章引起了查先生的注意。他欣赏我在美新处任职，却敢写批评美国的文章。那时候，我也已在《新生晚报》撰写介绍西方存在主义的专栏。”查先生赏识胡菊人的才能与识见，遂以总编一职诚邀加盟，后来证明这个伯乐的确眼光独到。胡菊人觉得在《明月》将有更大的发挥，欣然走马上任。他也没有辜负查先生的厚望，在执掌《明月》编务十二年间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使它成了海内外知识分子刊物的名牌。从查良镛到胡菊人，《明月》保持了一贯的编辑方针，以坚稳的立场、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国事世局，为时代把脉，为命运多舛的国家民族寻求出路。

胡菊人时代的《明月》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政治时事、文学艺术、历史人物、文化思潮等等，不少香港和海外的名人、学者都曾在此刊物发表文章，或接受专访，如张国焘、

蒋梦麟、蒋纬国、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殷海光、夏志清、张爱玲、唐德刚、余英时、白先勇、聂华苓、陈若曦等，都是掷地有声的名字。当年胡菊人刊登了不少殷海光的文章，后来殷海光因批评时局而遭受政治打压，被迫离开台湾大学，《明月》就隔海声援，胡菊人甚至委托香港留学生为殷海光带去食品。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因肝癌病逝，胡菊人得悉后极为伤感。

“文革”十年浩劫之后，中国出现了“伤痕文学”，一般都认为七十年代末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是“伤痕文学”开先河之作，然而，一九七三年，从中国内地出来，经香港移居加拿大的陈若曦，已在戴天的推荐下，把她多篇以“文革”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交由胡菊人在《明月》发表，包括《尹县长》《晶晶的生日》等。这批自一九七四年起发表的小说应是最早的“伤痕文学”，当年曾引发争议，影响颇大。而聂华苓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七十年代在台湾报纸连载时，因内容涉及敏感问题而横遭腰斩，胡菊人即把它在《明月》全文连载，该小说在一九七六年由友联出版单行本。此书一九八〇年在中国内地

出版，但被大幅删节，直到一九八六年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推出的修正版才是首个完整的版本。聂华苓在新版序里说：“《桑青与桃红》是一支浪子的悲歌。浪子的悲歌在台湾唱过，回到老家唱过——在两边都是一支没唱全的歌。”幸而，这支歌终于在香港唱全了。这段日子里，最令胡菊人高兴的就是收到好稿。

白先勇是胡菊人的老朋友。一九七六年他访港时，应胡先生之邀，在下榻的假日酒店与他对谈小说艺术，这次谈话由胡太太刘美美（刘道）笔录，整理成文，并先后收录在胡菊人《小说技巧》一书和白先勇散文集《第六只手指》中。白先勇两次应邀访问温哥华时，都向我表示一定要安排他跟胡菊人先生见面，当然都如愿以偿了。《明月》还曾刊出不少有分量的专访、特辑，如一九七一年，胡菊人就亲自访问了到香港的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明月》任职的孙淡宁也曾访问蒋中正后人蒋纬国将军。在当时，这些专访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二〇〇六年，《明月》创刊四十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总编辑、总经理潘耀明邀请了创办人查良镛先生和历任

的总编辑出席，胡菊人也应邀由加拿大回香港参加盛典。访问当日谈起《明月》，胡先生依然无限怀恋：“它应该是历史最长的一份中文杂志了，是早年文人办报留下来的一笔可贵的财富，实在很难得。”现在的传媒集团多走商业化的路线，《明月》至今仍坚守办刊宗旨，屹立不倒，的确难能可贵，这一切有赖于主事人的识见与胸怀。胡菊人说：“当年刊物成功的原因就是对中国问题与时局的深入探讨和分析，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最高峰时，杂志的销量接近三万份，除了香港，在新、马、欧、美等海外地区也拥有不少读者。”有人说，这个时期的胡菊人，就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守夜人。的确，胡先生所提的《明月》这盏灯，正是当年青年和知识分子前行的指引。

从《中报月刊》到《百姓》半月刊

一九七九年，胡菊人离开《明报》机构，接受傅朝枢的邀请，创办《中报》和《中报月刊》，担任总编辑。胡老忆述：“当时我向查良镛呈辞时，惜才的查先生大力挽留，并

劝说传媒竞争激烈，创办新报纸和杂志不容易，希望我能留下来。但当时我已和傅朝枢签了合约，一切已成定局，无可改变了。”胡菊人离开时，查先生送了一块劳力士金表给他，感谢他十多年来对《明月》做出的贡献。

胡菊人创办《中报》的情形与当年进入《明月》相约，更好的待遇，更大的发展平台，当时胡老相信这个机会可以让自己在新领域中尽展所长，获取更大的成就与满足感。胡菊人说：“我是在徐复观的介绍下认识傅朝枢的，之前对他的了解不多。傅是一个商人，对传媒的经营运作并不内行，他的《台湾日报》乃收购所得，而非亲自经营成功的。《中报》创办初期有六万销量，成绩不错，可惜老板不放手让采编人员去做，经常对版面作出干预。”陆铿在《香港〈中报〉的兴衰》一文中回忆说：“老傅弄来了大量的祝贺傅董事长朝枢创办《中报》的志庆广告，有的来自香港，有的来自台湾，今天是‘一纸风行’，明天是‘舆论权威’，这些无聊的东西老傅都要胡菊人以头版全版刊出，胡菊人指出这是‘毒药’。”

当时，《中报》只出纸三张，但这些免费的“人情广

告”浪费了篇幅，使重要新闻也被迫放到内页去。后来，胡菊人就只编《中报月刊》，不理报纸编务，不久更离职了。《中报》随着编辑方针的摇摆不定，内容质素下降，销量下跌，最终不得不停刊。

一九八一年，胡菊人与老报人陆铿创办《百姓》半月刊，陆铿担任社长，胡菊人出任主编之职，刘美美任经理。《百姓》也办了十多年，销量不错，最高峰时达两万份。然而，在香港独立办一份时事政论杂志，秉持认真严谨的态度，不哗众取宠，实在极不容易。胡老说：“《百姓》广告不多，靠销数来维持营运，在艰苦经营下方能收支平衡。后来我的健康出了问题，必须做腿部手术，无法继续编辑工作，假如聘请一位资深主编，在财政上又负担不来，只好在一九九二年把《百姓》售予商人徐展堂（一九四〇至二〇一〇）。可惜改为周刊后，不久就结束了。”然而《百姓》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此刊物仍然走政治时事与文化历史的路子，但比《明月》大众化。此杂志也曾有不少有分量的内容，如一九八七年，胡菊人与柏杨对谈中国历史；还有陆铿对胡耀邦的专访，在当时都颇引人瞩目。